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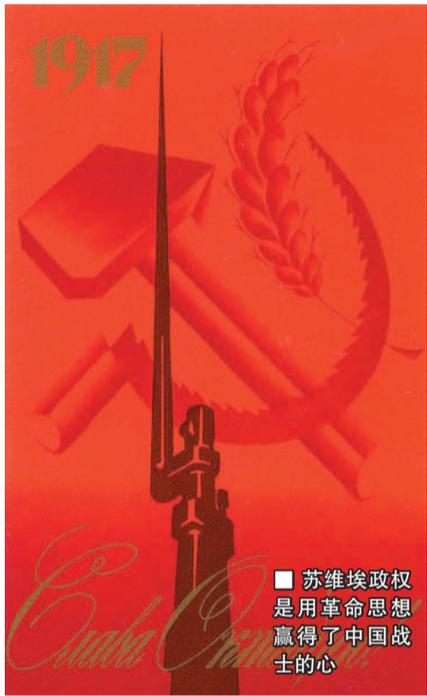
20世纪初,数十万华工进入俄国,他们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对旧制度有着天然仇恨



红鹰团列阵,前排左三为任辅臣



红鹰团灵魂人物任辅臣



苏维埃政权是用革命思想赢得了中国战士的心

东方英雄保卫苏维埃

苏俄红军中国团鏖战乌拉尔

背景材料

中国志愿兵的战后去向

1920年俄国革命战争大体告一段落后,多数中国志愿兵来到莫斯科,组成著名的“中国公社”。据统计,1926年,苏联境内共有十多万中国人。苏联史学家玛利亚·巴哈列娃记载,这些中国人聚居在今天莫斯科恩格斯大街的鲍曼地铁站附近,“中华民族复兴社”办事处就在这里,旁边是中国宾馆,里面有饭店,随后附近又开设一些中国商店,出售中式调味品和服装等。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中国退伍兵在莫斯科从事体力或手工艺工作,中国人勤劳努力,什么苦都能吃,生存能力极强。当时,莫斯科每个街区里几乎都有中国人开设的洗衣店,除了北京店、上海店和南京店外,还有“中国劳动者”“国民无产者”“张利兴”洗染行等,里面的伙计几乎都是退伍兵。

谢尔盖·戈利钦在《幸存者札记》中记载:“除了欧洲人,莫斯科来了很多中国人,他们不仅在集市上出售水果,还在全市各处开了多家洗衣店和杂货摊,包括中国城附近的伊万·费奥多罗夫纪念碑下。他们站在那里,面前是一堆自治的纽扣、梳子、皮表带和其他小东西。”很快,莫斯科就出现中文报纸和中国戏院。还有一些中国人加入共产国际并担任领导职务,为世界革命奋斗,其中不少人返回中国,协助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

要强调的是,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中国志愿兵的功勋,在罗斯托夫州、彼尔姆边疆区、北奥塞梯共和国、沃罗涅日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都建有纪念设施。特别是时至今日,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旁边,安放着一座朱可夫、高尔基、加加林等苏联名人骨灰的克里姆林宫红墙旁的墓地上,仍保留着一座大理石纪念碑,上面用规范的俄文镌刻着“张、王——1917年牺牲”,这是191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列宁亲自揭幕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之一,这里安葬着苏俄革命期间献身的两位中国人,具体是谁,“张”什么,“王”什么,已无从考证,也许仅仅是冠以“张、王”两大中国姓氏以示纪念。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这就是中国志愿兵的无名烈士墓。

乌拉尔山是欧亚分界线,其周围的彼尔姆边疆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更是俄国革命战争中的主战场,苏俄红军在此与帝国主义支持的白卫军浴血奋战。对中国来说,那里很陌生,但并非没有关联,因为红军里的华工表现得异常勇敢,这些东方英雄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俄罗斯人永久的崇敬。



位于特罗伊察村的中国志愿兵纪念碑

必须争取的兄弟

1914年一战爆发后,沙俄将大批青壮年充军,不得不从中国招募华工维持国内生产,有的上山挖煤伐木,有些技艺和文化的则去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大城市务工,甚至被强制送上前线挖战壕,当炮灰。由于战事吃紧,在俄华工从1915年末的4万人骤增至1917年春的20万人。1917年3月,无能的沙俄政权轰然崩塌,大批华工生活无着,又难以回国,只能在各地游荡。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甘心失败的沙俄余孽仰仗帝国主义支持,组织起五花八门白卫武装来围攻苏维埃政权,他们用蝇头小利乃至直接暴力手段控制华工,从而增强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年轻的苏维埃也意识到苦难的华工是“值得争取也必须争取的阶级兄弟”,于是通过各种政策,把他们发动起来闹革命。俄历史学家K·摩尔佐·莫罗佐夫指出:“和莫斯科等重镇相比,乌

战场上的“雄鹰”

1918年3月,红军在乌拉尔的第一支中国志愿分队诞生了。7月28日,250名中国志愿兵作为特种分队主力,镇压沃特金斯克县富农叛乱,紧接着投入恰斯特耶、巴布基、诺若夫卡、克雷洛沃、叶尔帕奇哈、巴尔达和叶沃沃村战斗,令白卫军闻风丧胆。1918年秋,乌拉尔最大的红军华工部队——农民共产主义第1团(后改成第225国际主义团,也称“红鹰团”)在列日村一战成名,当时负责把守

18公里长战线的沃伦团突然倒戈转向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领导的白卫军,红鹰团临危不乱,主动接管阵地,一举击溃叛军和白卫军的内外夹击,赢得了无上荣光。

1919年,同红鹰团屡战屡败的白卫第1志愿军军长库捷波夫好不容易搜集一些关于中国志愿兵的情报,表明这些东方人是红军中战斗意志最坚决、战斗素养最高的战士。与红军中常见的俄

英名永不陨落

1918年冬至1919年夏,是苏俄最危急的时刻,弱小的红军面临国内外敌人从四面八方发起的围攻,尤其在乌拉尔,英美日豢养的高尔察克白卫军以40万之众冲过伏尔加河流域,彼尔姆、叶卡捷琳堡等名城相继失守。作为红军主力,红鹰团转战多地,维系脆弱的战线,最终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消耗殆尽。

在红鹰团的战史上,最悲壮的战斗发生在今天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维亚车站和彼尔姆边疆区的特罗伊察村。俄历史学家尼古拉·波波夫写道:“1918年底,高尔察克白卫军选择

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之间进行战役突击,突进到科特拉斯地区,将与从北面来的英美干涉军会合。当时,敌人从叛徒那里得知红鹰团团长任辅臣所率的一支分队乘专列经停维亚车站,打算前往萨尔德村和拉亚村建立新防线,白卫军如获至宝,立即组织优势的哥萨克骑兵展开围攻,任辅臣拼死抵抗,掩护友邻的红军第17彼得格勒团和第1卡梅什洛夫团撤退,而自己光荣牺牲,整个红鹰团分队有百余人阵亡,只有62人突围。”

维亚车站之战后,红鹰团余部在刘汉钦(音)指挥下转到丘索沃伊整编,在补充利亚明铁路支线的

罗斯人、鞑靼人或乌克兰人不同,中国人纪律严明,不管形势多恶劣也绝不逃兵。他们大多不懂俄语,弄不清俄国宗教、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但服从命令绝不在话下,因此红军将领经常把艰难险重任务交给他们,而且他们总是不负众望,能很好地完成连俄军战士都难以遂行的任务,为保卫乌拉尔的苏维埃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中国人敢于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嫉恶如仇的勇猛表现,令白卫军痛恨不已,因此一旦抓获,根本不加审判即处以极刑。”莫罗佐夫说。

华工后,于1918年12月上旬来到彼尔姆,缩编为一个中国营,由梁泽亨(音)任营长。12月24日至25日,该营在彼尔姆第二火车站与敌拉锯,中国志愿兵死守机枪阵地,与白卫哥萨克殊死搏斗,由于战斗太过惨烈,全营撤下来后只能缩编为一个连,很快又在彼尔姆的接近地特罗伊察村投入村落巷战,牺牲250人,剩下的也都是重伤员。

到1919年初,已基本听不到有关乌拉尔中国志愿兵的消息了,可以说,红鹰团在特罗伊察陨落,当地关于中国战士的记载就销声匿迹了。1953年,苏联政府在特罗伊察战斗遗址瑟尔瓦河畔建起中国志愿兵纪念碑,后因基础设施改造,纪念碑于2000年被拆除。但在彼尔姆边疆区政府和当地居民努力下,2012年中国志愿兵纪念碑重又矗立,碑文上书“1918年12月25日至27日在特罗伊察镇瑟尔瓦河畔被白匪杀害的中国志愿兵纪念碑,250名中国志愿者和4名当地居民永垂不朽”,中国战士的灵魂在这里得到了永生。

常立军 张韶华



苏俄货币印有中文“全方贫工之联合”